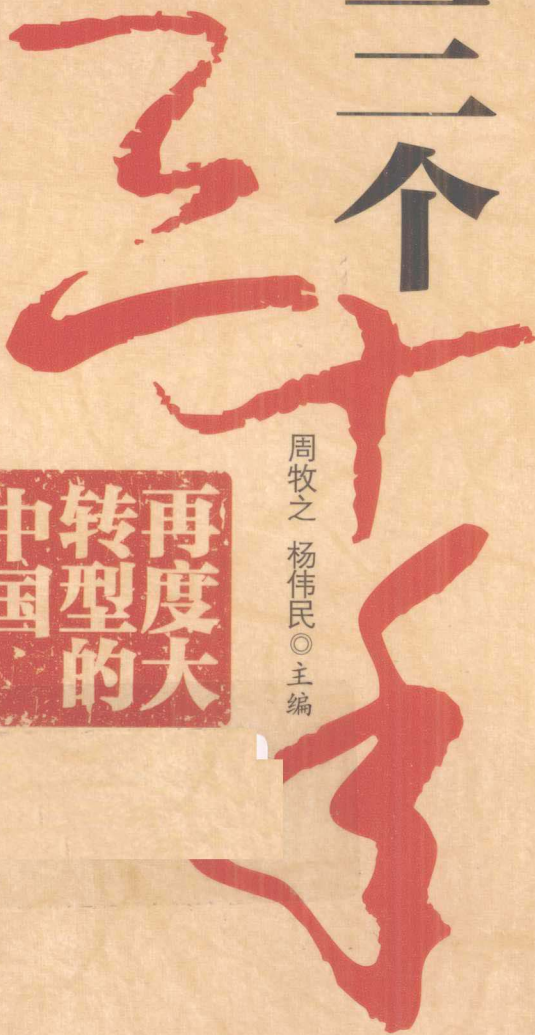




改革发展模式 变革社会机制
创建全民共享繁荣 引领全球经济发展

第三个



周牧之 杨伟民◎主编

The Third Thirty Years
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



人民出版社

第三个

三十年

周牧之 杨伟民◎主编

The Third Thirty Years
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
再度大转型的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三个三十年：再度大转型的中国/周牧之 杨伟民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

ISBN：978-7-01-008945-4

I. ①第… II. ①周… ②杨…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②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9456 号

书 名：第三个三十年：再度大转型的中国

拼 音：DISANGE SANSHINIAN；ZAIDU DAZHUANXING DE ZHONGGUO

作 者：周牧之 杨伟民

责任编辑：许运娜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 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网 址：[http://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邮购地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65289539

印 刷：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452 千字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24.75

书 号：ISBN：978-7-01-008945-4

定 价：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周牧之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196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曾供职于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历任日本开发构想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国际开发中心主任研究员，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中国经济论——崛起的机制与课题》（2008年，人民出版社），《鼎——托起中国的大城市群》（200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主编：《大转折——解读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200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城市化：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200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杨伟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6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曾上山下乡、当过工人和教师，1989年调入国家发改委（原国家计委），历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长期以来主要从事国家中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是国家重大产业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之一；参与了国家“八五”、“九五”计划纲要的起草，负责“十五”和“十一五”计划纲要起草和组织协调。

主要著作：合著《中国的产业政策——理念与实践》（1999年，中国经济出版社），主编《规划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2003年，中国物价出版社），《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研究》（2004年，

中国市场出版社)等。

●范剑平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研究员。

1957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国家信息中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主要著作:《居民消费与中国经济发展》(200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国经济展望》(2002年,中国计划出版社)、《2010年中国与世界发展报告》(200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我国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和消费政策研究》(2006年,中国经济出版社)。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

1963年出生于湖北省宜都县(现为枝城市)。曾供职于国家计委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劳动局、国务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办公室和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期致力于人口、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研究,有科技部国家科技发展咨询顾问、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等多项兼职。

主要著作:《中国老龄社会背景下的退休安排》(2008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回顾与展望中国劳动人事社会保障30年》(主编,2008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当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主编,2006年,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攻坚》(主编,2005年,水利水电出版社)、《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攻坚》(主编,2005年,水利水电出版社)、《中国转轨时期的就业问题》(2002年,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主编,200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

●杜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主任兼智力引进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

第三个三十年

会长，以及中国科学院资源与地理研究所、浙江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1982—2007年，先后在国家发改委（原国家计委）地区协作计划局、地区综合计划司、国土地区司、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综合组工作，历任处长、所长、司长等主要行政职务。长期参与有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土开发、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领域的国家规划、计划、战略和政策等研究起草工作以及相关业务管理工作。

1999—2003年在研究所工作期间，先后主持完成了30多项研究课题，共出版关于区域经济和西部开发等领域的专著和编著7本。另外，还曾以国内专家身份参与过亚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德国经济技术对外合作公司等国际组织在华开展的研究咨询活动。

● 马晓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1955年出生于陕西省大荔县，曾供职于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历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目前是中央重点联系的高级专家。

主要著作：《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政策演变》（2009年，中国计划出版社），《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200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战略研究》（2008年，中国计划出版社），《结构转换与农业发展》（2004年，商务印书馆），《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研究》（2002年，中国计划出版社），《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2000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1世纪中国粮食问题》（1999年，中国计划出版社）。

● 武翔宇：

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1979年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2008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农村金融研究。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9 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 年 5 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 年进入 UCLA，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 年春季起，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任教。2008 年 6 月起担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研究兴趣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

●徐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司长。

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司处长和副司长，参加过若干国家五年计划、产业政策、区域规划的编制，参加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目前主要负责财政、货币政策，以及财政金融领域发展和改革问题的研究。

●朱晓明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60 年生于江苏省镇江市，经济学硕士。1986 年进入江苏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从事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曾任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国土处处长、苏北发展办公室常务副主任，2004 年经公开选拔担任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长期从事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区域经济、服务业等工作。主持研究和起草了《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江苏省沿江开发总体规划》、《江苏省沿海开发总体规划》、《江苏省沿东陇海线产业带建设总体规划》等重大规划和区域、

第三个三十年

服务业等方面的重大政策等。

主要论文：《关于我省居民收入的分析和建议》、《从欧盟地区政策看我省区域经济发展》、《流动、融合、分工——推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进程》。

●张仲梁

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副会长，经济学博士。

1962 年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曾任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主任、《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总编辑、国家统计局统计教育中心主任、卡斯特经济评价中心执行主任、PECC 金融市场发展中国委员会秘书长、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特别研究员，兼任中国国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欧美同学会商会理事等社会职务。出版论著译著 12 种，发表论文 100 多篇。

●薛凤旋

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暨地理学讲座教授。

毕业于香港大学，地理学硕士；1974—1977 年就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1977—2007 年在香港大学任教三十载。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暨地理学讲座教授。除担任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外，也是多所大学，包括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福州师范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及荣誉教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澳门大学名誉研究员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及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城市研究中心特约教授及研究员。出版专著及编著 30 多部，国际论文 100 多篇。

自 1977 年起就有关中国的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范畴涉及中国经济、中国与全球体制的连接、城市和区域发展、社会和政治演变等。著述获广泛推崇及经常被引述。

积极参与香港地方，以及国家的政治与决策，是第八届至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香港特区筹委会，以及多个特区政府咨询委员会成员。

● 郑佳明

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历史学硕士，研究员。

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长沙市岳麓区区长，长沙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湖南省委外宣办主任、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主任，红网董事长，湖南省委宣传部巡视员。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曾担任电视剧《雍正王朝》总监制、《走向共和》总策划、《恰同学少年》总策划，大型电视理论专题片《走向和谐》总撰稿，湖南电视台《故事湖南》节目特约评论员。

主要著作：主编《长沙历史文化丛书》（1—6卷）（199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创业大本营》（2010年，人民出版社）；《晚清政府闭关状态心态研究》（201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变局的世界与变革的中国

周牧之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轰然倒塌，世界格局骤变，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旋律。二十年来，全球GDP从20万亿美元猛增至60万亿美元，人类步入一个空前的成长和变化的时代。它比500年前大航海带来的大变局来得更猛，比200年前产业革命带来的大变局来得更烈，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巨变。

一、三大革命与格局剧变

IT革命、低碳革命和全球化的三大革命正在涂改人类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模式。

在生产上，企业冲出国界走向全球，更加全面地依靠全球供应链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最合理的生产和销售。产业发展模式更是从满足市场需求转变成创造市场需求。在消费上，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互联网全球采购信息和物品。以百货店、超市和便民店为代表的传统零售业跌入冰河，相反，网络销售量一路飙升。报刊、杂志、书籍、DVD / CD的销量急剧萎缩，在线阅读、在线音视等新业态正在疯长。

新产业不断横空出世，传统产业也正在经历变革的阵痛。从最大的传统产业——汽车产业的风云突变可以窥视到大变革之一斑。曾经是美国繁荣象征的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相继破产，日本第一大企业丰田汽车深陷“召回门”，全球众多的汽车巨鳄大多经营窘迫。究其原因，并不单是企业经营不善和金融危机下的市场大缩水，实际上全球汽车业正在经历一场由电动化、全球配套化和 IT 化引发的“三化”大变革。

1. 电动化

所谓电动化是指汽车从燃油发动机向电动马达的转型，每台汽车需要的零部件将从大约3万点锐减到2万点，这意味着大批与发动机相关的零部件供应商将被蒸发，相反与电池和电动马达相关的厂商可以大展宏图，更重要的是汽车大鳄们的产能规模突然变脸成阻碍转型的包袱。最近电动汽车的风云角色大都是拥有电池等核心技术又没有历史包袱的后起之秀，比如中国比亚迪的异军突起，特斯拉（Tesla）等美国制造商的生猛腾挪。与传统汽车厂商动辄拥有几万到几十万员工相比，这些电动汽车黑马多属轻装上阵，有的只有几百上千人，许多过去甚至不生产汽车，完全是一批“另类”的挑战者。

2. 全球配套化

第二个是全球配套化。全球各大汽车巨子过去都各自拥有数以千计的以资本关系、历史渊源和地缘维系的配套厂。但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汽车厂商正在构筑开放型的全球配套商业模式。为谋求生存，零部件厂商也正在从供应特定汽车厂走向为更多厂商提供产品，整个汽车产业的配套和协作正在向开放型模式大转型。

3. IT 化

IT 化更是将汽车嬗变成会行走的“IT 大机器”。用于通信和控制的车载半导体的成本今天已经占到每辆汽车销售价格的 5% 左右，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比例将会达到 20%。主导汽车产业发展的技术已经由机械技术让位于 IT 和能源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资源更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组合，整个产业生态正在大更替。

从汽车产业的剧变可以看到在 IT 革命、全球化、低碳革命三大浪潮推动下，全球所有的产业都在经历大洗牌。中国正是在这一大变局中顺因世界潮流，迅猛崛起，跃进为新的世界工厂。

第三个三十年

2 - The Third Thirty Years: 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

二、繁荣的要义和消长的变迁

世界格局剧变不仅改变了企业形态和产业生态，还改变了城市和国家的繁荣条件。改革、创业和开放成为新时代缔造繁荣的三大要义。中、日、美三国在过去二十年的消长盈缺正是对三大要义的绝妙注释。

1. 锐意改革

谋求新格局下的发展，首先必须改革旧的游戏规则，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计划经济的困局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索中迎来时代转折的中国，彻底诀别计划经济，果断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迎合世界新潮流，实现了爆发性的发展，二十年来按人民币计算的 GDP 陡增 20 倍（按美元计算增长了 11 倍），成就骄然。

美国在西海岸开辟了以硅谷为代表的，与旧势力、旧秩序性格截然不同的 IT 革命根据地，缔造了新经济、新繁荣。

反观在泡沫经济巅峰期迎来柏林墙崩塌的日本，难以忘怀旧时代的辉煌，不肯放弃过去的成功模式，无论是在国政还是在企业形态上都没有真正找到再造繁荣的方略。在全球大发展的时代，经济规模二十年几乎没有变化，战后第一个东亚奇迹的创造者从冷战时期的宠儿跌落成全球化时代的徘徊者。

2. 创业创新

新时代打造繁荣的第二要义是需要以旺盛的创新精神开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企业形态，应对三大革命。在这一变化的时代，最重要的创新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创业是创新商业模式的最佳途经。

在中国，今天支撑经济大国之路的企业在二十年前大多还不存在，或者弱小得可以忽略。正是按捺不住的创业冲动缔造出来的千千万万新生企业，复合成今天中国大发展的动力。

在美国西海岸的硅谷，无数工程师们的创业冲动把冷战时期美国的科技储备和 IT 火种演变成新生活方式、新需求和新产业，苹果、谷歌、雅虎、亚马逊、易趣、Facebook……，层出不穷的新兴企业，主导了 IT 革命新潮。

相反在日本，二十年来没有催生出一家能在全球引领风骚的新企业。IT 业界依然是日立、索尼、松下、东芝、三菱、夏普等前 IT 时代的老店联手遮天。日本政府和企业虽然极其重视研究开发，投入甚巨，近年诺贝尔奖连连摘冠也标志该国已经走

出改良型技术发展模式，其基础科学领域成就正在逐渐被世界承认。然而产业巨鳄们却大都表现欠佳，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更是陷入“赤字大合唱”。应该说，是战后蔓延的工薪社会风潮吞噬了日本的创业冲动，窒息了把技术创新演变成为创业的社会活力，导致无数先进的技术和产品胎死腹中。

3. 开放国门

开放是在全球化时代营造繁荣的另一要义。谁能为全球英才提供创业、创新平台，谁就能够成为坐地分红的庄主。在全球化时代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把立国之本定位在为全球企业和精英提供创新、创业平台。中国正是开放了国门，向全球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成就了自身的大发展。

美国硅谷在这一点上堪称经典，正是大批来自中国、印度、欧洲的寻梦者们的创意和创业在短短几十年内把一片荒凉之地打造成 IT 革命的童话世界。美国大学的聚才功绩也堪称卓越，多达 67 万的在校留学生为该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外来人才和创意，今天外国出身者已占到在美国获取工程博士者的半数以上。

在这一方面，日本远落伍于时代。讲究以心传心的封闭文化致使日本企业即便在国外安营扎寨也大都以日本人把守核心高层，最终造成以一国之才对抗全球精英的局面，其结果可想而知。

新时代的创新和创业来源于人与人的交流和碰撞。开放、宽容、便捷和魅力是吸引全球英才们往来、学习、工作、居住的前提。同时，提供交流平台也给城市带来新时代的发展机会。为促进不同背景人们的交往，打造开放的魅力城市之努力不可或缺。

三、危机与改革

2008 年华尔街引爆的金融危机加速了大变局和繁荣的更替。2009 年是历史上中国最受世界关注的一年，超过 8% 的经济增长为灰暗岁月里的世界经济造就了新的引擎。中国的国际地位骤然上升，美国甚至有人提出由中美共治世界的 G2 设想。鸦片战争后经历了 170 年的苦难磨砺，黄色巨龙终于得以翻身。

危机使人渴望变革。危机下追求变革的大众心态造就了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和战后日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权交替。

但震源华尔街的改造却远还没有到位，一些金融机构甚至一边接受政府救济，一边大发奖金。针对把垃圾打包当成宝贝卖的投机游戏，美国政府也还没有更改重大

第三个三十年

的游戏规则和监管机制，孕育危机的土壤并没有清除，另一轮的金融风暴可能再来。

金融危机下，西方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更是急剧恶化，日本、意大利、美国、德国的国家债务对 GDP 的比例已经分别高达 218.6%、115.8%、84.8%、78.7%。希腊债务危机给无节制的国家举债敲响了警钟，但上述国家还看不到改善财政状况的端倪，债务危机随时都可能引爆世界性的经济大波动。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风暴中，出口急剧缩水在中国也导致大批企业倒产、大量农民工失业。究其原因，一是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出口市场，美国的骤变把中国经济瞬间拖入冰河；二是长期讴歌经济发展造成对政治、社会改革的怠慢，体制缺陷严重地制约了应对危机冲击的承受能力。

依靠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财政和宽松的金融政策，中国虽然维持了高速增长，但横亘在面前的困难如山：出口受挫、贫富差距、资产泡沫、环境污染……。未来西方各国债务的进一步恶化、美元的暴跌和新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都可能撼动中国经济。

在全球房市、股市一片叫跌声中，中国房市、股市的狂涨显现中国经济的新局面。这种奇特现象不仅源于过分宽松的金融放贷和在房地产领域制约机制缺位，更有国内外投机游资的兴风作浪。曾经使美国金融政策失效，格林斯潘称之为“谜 (conundrum)”而无从应对的国际游资，已经开始困扰中国的经济运营。

潜伏在发展模式中的问题凸显出来。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分配的不均衡与再分配体制的欠缺却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分裂和对立。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分配率的低下，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收入和福利长期处于极低的水平。分配的不均衡使庞大的农民和劳动者群体没有充分享受到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内需市场的成长也因此受到遏制。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另一重大问题是缺乏再分配机制。从社会群体来看，收入增长较快的群体和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收入减少的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从地区差距来看，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讴歌大发展相比，许多内陆地区产业欠缺活力，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衰退的现象，地区差距越拉越大。

缺乏再分配机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造成享受到和没有分享到成长果实的群体之间的社会分化日益扩大，引发了高度的社会紧张。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国在强敌环视之下，凭借计划经济总动员，自力更生地实现了初步的重工业化，确立了捍卫独立和尊严的基本实力。但是长期牺牲国民生活水准和农民利益的工业化路线，以及频繁的政治运动导致经济活力丧失殆

尽，特别是人民公社化的农村经济濒于崩溃。

第二个三十年，改革开放释放封存已久的活力，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打造出一个新兴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然而，重工业化路线遗留下的二元社会结构并没有被清算，户籍制度吞噬了亿万农民工在城市的权益，低劳动分配率和再分配机制缺位更把中国从一个平等、平均的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分化成沟壑分明的阶层社会。

今天的中国，高速经济发展与高度社会紧张并存，社会紧张的增幅正在威胁中国社会的安定与发展。与三十年前站在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一样，今天的中国再一次站在历史性的变革关头。在未来的三十年，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发展模式，变革社会机制，改革社会结构，以全新的姿态创造全民共享的繁荣，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为此，需要着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户籍制度、强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需要将高能耗、高污染发展转化为绿色、低碳发展，还需要将弱元（人民币）/出口依赖型经济打造成强元 / 内需主导型经济……

1. 转换发展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由于长期身处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不得不将扩大工业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目标，全力推进重工业化。为此政府一直采取了要求国民以贡献和牺牲支持工业化的政策，特别是剥夺了农民在城市就业和居住以及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权利，形成了极度限制农民权益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限制农民权益的社会结构却一直延续至今。中国虽然为追求扩大生产力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对社会结构的改革却还刚刚起步。

今天的中国亟待从根本上改革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二元化社会结构，将社会发展的目标从扩大生产力转变到建设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和谐社会上来。

2. 实现内需型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一个经济贸易大国横空出世。过去物资极度匮乏，靠农副产品苦挣外汇的中国今天被海外赞誉“世界工厂”。然而过分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使中国与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不断扩大的贸易不平衡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各国指责中国的口实，中国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市场开放、扩大进口等问题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扩大内需市场的关键是如何增加被成长疏远人群的收入水平。为此，首先

第三个三十年

需要通过城市化将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服务业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同时必须提高工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劳动分配率，促进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

在中国，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有需求但是供应不足，甚至没有供应的领域，这种领域集中在第三产业。因此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推动扩大内需的潜力非常大。

第三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打破垄断。特别是在垄断倾向较强的金融、运输、通信、文化、传媒和网络等领域，如果不打破垄断状态，不可能有第三产业大发展的局面。

服务产业的发展还需要缓和管制。政府需要将文化和大众传媒作为产业看待，缓和对这些领域的管制。中国需要给这些极具前途的产业开放更多的发展空间。

3. 构建再分配体制

中国现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将经济发展的恩惠分配到所有的阶层和地区。如果能够成功地解决分配问题，中国经济将会顺利地实现由出口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实现长期安定的发展。相反，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将有可能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影响社会稳定，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再分配机制的建设十分重要。

中国现在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再分配机制。中国亟待构建有效的再分配机制，缓解正在扩大的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从扩大消费的观点来讲，也需要消除人们对未来的不安。

为此，必须摒弃为二元社会结构所束缚的思维模式，构建以全民为对象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国民最低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4. 改革财政机制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动力是地区间竞争。但是在以利用世界资源和参与国际大分工为前提的发展模式下，有深水港的地区和远离深水港的地区之间在发展条件上存在着天然的差异，这种差异是造成中国地区间不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无视发展条件差异的地区间竞争扩大了地区间社会经济差距，更严重的是，缺乏发展条件的地区，盲目追求发展的现象愈演愈烈。无视发展条件制约的盲目追求所带来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了大规模的资金浪费、土地浪费、人力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使本来就紧缺的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地方财政的窘迫导致地方政府向土地

要财政，向收费要财政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这种地方财政对所谓“第二财政”和“第三财政”的依赖造成了严重的土地问题和乱收费问题，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三大城市群的高速发展和内陆部分地区产业活力欠缺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鲜明的今天，需要认真地对待地区间竞争所造成的结构问题。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跳出地区间竞争的发展模式，中国需要在持续发展大城市群、大城市的同时，缓解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压力。

为了缓解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压力，必须改革由地方政府为主负担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现行体制，提高中央财政在这些领域的投入。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施行大规模财政转移，保证地方行政财权和事权的统一，实现一定力度的地区间再分配，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确保社会保障的落实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此，需要对财政机制进行彻底改革。

5. 再造农村社会

今天，中国正在发展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却仍然徘徊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和居住权益、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同时，大量劳动力的流出也彻底破坏了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的空洞化发展迅猛，不可逆转。商品经济的渗透更使自给自足的小规模农业难以为继，中国的农业生产也进入了需要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时代。

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将三农问题放到城市化进程中来思考，改革户籍制度，构建城乡间相对公平、覆盖全民的医疗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从根本上变革二元化社会结构。同时，与城市化、大城市群化相连动，中国农村社会的重建时不可待。需要通过实施村落合并、乡镇合并、土地制度改革、农村行政服务体系建设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以人口向城市转移为前提的农村社会重建。

6. 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

中国激烈的地区间竞争是在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展开的。在追求经济发展的热潮中，促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机制巨大，相反，制衡发展的机制欠缺。没有有效制约机制的地区间竞争酿成了许多深刻的问题。

以土地问题为例，地方政府通过对土地资源的流转和开发不仅可以获得“第三财政”收入，同时提供廉价的土地也是现今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为了招商引资，正在无节制地进行大规模土地开发。这种现象在中国造成了

第三个三十年